

国际政治学名著译丛

世界政治中的 战争与变革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政治学名著译丛

世界政治中的 战争与变革

(美) 罗伯特·吉尔平 著

武 军 杜建平 松 宁 译
邓正来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 新登字 156 号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obert T. Gilpi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国际政治学名著译丛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美) 罗伯特·吉尔平 著

武军 杜建平 松宁 译

邓正来 校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100872)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字数：202 000

印张：8.125 插页1

版次：1994年7月第1版

印次：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册数：1—3000

书号：ISBN7-300-01971-4/D·259

定价：6.90元

世界政治变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写在前面的话

宋新宁

罗伯特·吉尔平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担任“美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现在的美国“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委员。吉尔平教授先后写了三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术专著，即《美国的权力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 S. Power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975）、《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并且在《世界政治》、《国际组织》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有关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是他自认为最得意之作，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在西方被列为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吉尔平教授可以说是这一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既然被称为是“国际”的“政治经济

学”，那么它就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有着不解之缘。该研究领域自 70 年代开始兴起绝非偶然，既有 70 年代初期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经济领域竞争加剧的客观历史条件，也有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经济学之新发展作为其动力。

政治经济学自 16、17 世纪由欧洲的重商主义者提出，经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完善或修正，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学说，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受到冷漠，或者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被现代经济学所取代，为人们遗忘了半个多世纪。即便是凯恩斯主义也没有能够使其恢复活力。50 年代末以后，西方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复兴。现代政治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研究的重点既非经济、也非政治，而是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里，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市场、政治与市场、权力与金钱、权力与财富等等的相互关系构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根据吉尔平教授的观点，“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与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来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研究的领域”。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它“涉及的是国家及其政治功能如何影响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和政治利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分布，以及经济活动的成本和利润的分配”；同时，它还涉及“市场和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家和其他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和福利的分配，尤其是经济力量如何改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国际分布”。但是，政治经济学又不是研究国家和市场本身，而是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周而复始的发展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可

以说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

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往往与国际政治学是同义词，即把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或权力关系置于首要地位。按照汉斯·摩根索的观点，“国际政治学的任务就是把政治学的一般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并根据国际政治的独特性质对这些原则重新加以表述、修正和规定”。而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强调权力的政治作用”。因此，早期的国际关系学主要研究的是以主权国家为主的政治行为主体的对外政治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其核心内容是国际政治权力的控制、国家安全、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尽管早期的国际关系学也涉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但是经济问题往往被视为“低层政治”，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6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并且深入到了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变化使得作为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之核心概念的“国家权力”、“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都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甚至连汉斯·摩根索也承认，70年代以后，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的功能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一些军事弱国“垄断或半垄断地控制了对经济发达国家的运行至关重要的原料”。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她于197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西方的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却未能跟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没有致力于发展一门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反而继续容忍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长此下去，“势必使整个国际关系研究走入死胡同”。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立一种综合的理论，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结合起

来。这种新的用以修正原有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就是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与传统现实主义相对照，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1）它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单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在研究国际政治权力的同时，注重从国际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探寻各种限制和制约国际政治的因素，特别是经济及其他社会因素，强调国际社会的总体结构功能对国际行为主体对外行为的作用和影响。（2）它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单纯以主权国家及其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政治分析，强调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和跨国行为者之作用不断加强的必然趋势；在分析国家利益的同时，注重对地区性和全球性共同利益的研究。（3）它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片面强调政治行为独立性的倾向，在研究国际政治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对国际经济、国际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伦理学等国际关系学的分枝领域。（4）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它综合了传统现实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既注重理论，又不忽视应用；既进行定量分析，又进行定性研究；既注意宏观问题，又关心微观理论。总之，新现实主义者力图使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和物理学科在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兼收并蓄的独立学科或边缘学科”。

罗伯特·吉尔平教授被认为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1970年，他发表了《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一文。在1975年出版的《美国的权力与多国公司》一书中，他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看法，并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的交互能动作用”，并系统地论述了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作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是他首次“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结合起来”对国际关系理论进

行系统探索的尝试。笔者曾经向多位英美国际关系学者征询过他们对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看法，许多人都首推这本书为该领域的佳作。

(二)

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吉尔平教授《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注重于研究稳定而忽视了对变革的研究，即使有一些对变革的研究，也主要停留在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问题上，在分析变革之根源时，并没有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体系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相对稳定时期，但是自70年代起，世界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变革时期”。所谓国际政治的变革，是指某一特定国际体系之结构性变化。在吉尔平看来，国际体系本身是由三部分组成，即多种多样的行为主体；行为主体间有规则的互动；某种调整行为的国际控制机制。国际体系的变革也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体系的变更”(systems change)，即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如行为主体类型的变化。二是“系统性变革”(systemic change)，即对国际体系之统治的变化，或体系内部的变化。三是“互动的变化”(interaction change)，即行为主体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形式的变化。国际体系的变革还有“渐进性变革”(incremental change)和“革命性变革”(revolutionary change)之分，前者是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变革模式，后者为激进主义者所推崇。吉尔平对变革的这些看法并没有什么独创性，前人在这方面早已有诸多论述。吉尔平的重要创见在于他对变革的动力及根源之分析。

吉尔平首先假定：如果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力求变革国际体系是有利可图的，这种体系就是稳定的，即处在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一个国家就将力图变革这一体系。因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是由国家或其他行为主体之行为所决定的。那么，决定国际行为主体行为的又是什么呢？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家总是力图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保持和增强权力，它们往往不顾收益和成本之间是否保持对自身有利之平衡。在吉尔平看来，一个国家是否要变革或稳定某种国际体系，并不仅仅出于追求政治权力的需要，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是经济体系，即商品与劳务之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法和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资料中的变革是政治行为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其次是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化。第三是交通和通讯的发展。第四是军事技能和技术。吉尔平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变革进程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力图在经济上获益的愿望是寻求变革国际体系的强大动力，因而群体间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是经济活动类型，尤其是行为者能从国内或国际分工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那种经济活动的类型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权力分配本身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由于经济效率、工业场所或者贸易趋势的变化，财富的源泉基础也发生变化的话，必定会相应发生群体间和国家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为了获得权力而进行斗争与力图经济上获益的愿望最终会纠缠在一起”。

国际政治的变革并不仅仅是国家之对外行为的结果，也不是某个国家力图改变就能够予以改变的。国际政治的变革归根到底是一种结构的变化，即国际政治体系本身的变化，例如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变为多极或一超多极。吉尔平在书中对国际体系的结构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这里，他接受了美国学者肯尼思·沃

尔兹的结构理论，即认为“结构是指构成一个国际体系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在他看来，“国际体系结构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对行使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体系变革所要付出的成本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影响着组成能够取胜的联盟或形成权力的抗衡的难易程度。这些结构因素决定了一个国际体系的稳定或动荡，从而促进或抑制国际政治的变革”。

现代国际体系的特征是什么？它与前现代时期有什么区别？吉尔平分析了历史上的三种国际体系的结构模式，即原始社会和奴隶制时代的地方化结构，其特征是社会无力产生足够的经济盈余投入政治或经济的扩张；帝国制结构，其特征是以农业作为产生盈余的主要形式，而这些经济盈余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武士、宗教或官僚阶层所占有；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吉尔平重点分析了现代结构，并将其与帝国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

国际体系结构由帝国制向现代结构的转化，是与农业结构向工业结构的转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帝国时期，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化的财富和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对农民和农奴的剥削，经济盈余的来源主要取决于帝国版图的大小。因而，扩展领土并以此扩大政治控制的范围就成为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三种相互关联的重要发展导致了帝国体系的终结：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主角的民族国家的胜利；建立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的出现；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

在17世纪以前，国家的财富与权力经常处于分离状态，“现代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创造和捍卫人类整套财产权和人类自由的概念，从而缩小了个人和社会成果率之间的差距”。对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确立作用最大的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出现。不论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都造成了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方式的重

要变革。从理论上讲，一个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是不从属于任何国家或集团的，它可以通过其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活动的直接目标并不是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安全，而是最终有利于消费者，但是它在实践中又对国家权力和安全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之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理论的主要不同点之一。吉尔平显然是站在古典自由主义一边的，但是他又没有拘泥于自由派的传统。他认为，世界市场经济的出现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但同时又依赖于政治体系的多元化结构，即单一帝国政治统治结构的崩溃、民族国家的出现。在这里，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周期理论”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这种理论认为，全球政治体系经历了一种明显的、可辨别的历史循环或周期性行为模式，在每一个周期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支配着世界。例如 16 世纪的葡萄牙、17 世纪的荷兰、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再至 1945 年的英国、1945 年后的美国。每一个周期的结束和新周期的开始，都是以战争为标志的。导致这种周期的条件是什么呢？根据吉尔平的观点，这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正处在上升地位的大国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二是全球体系中财富与权力间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财富与权力分配结构变化的国内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1）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2）军事技术成本增加的趋势；（3）私人 and 公共消费的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总趋势；（4）经济性质的结构转换；（5）富足所导致的腐败。就国际因素而言，不断增加的政治统治成本是导致霸权国家衰落的最重要原因。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不断地扩充其财源以支付越来越庞大的军事开支。在前现代时期，帝国增加岁入的主要途径是从农民身上榨取财富和不断扩展自己的版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其无法从农民身上

获得足够的资源。版图的扩大又进一步增大了统治的成本，最终导致了帝国体系的崩溃。在现代社会，情况虽有不同，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最终都面临着无法以足够的财富来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英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长期优势地位，以及自由贸易体制的确立，使其得以长期稳定地获取高额岁入，因而“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维持了两个多世纪。而美国的霸权地位仅仅二十几年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与第二个国际因素，即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联系在一起。

在讨论国际政治变革问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战争问题。吉尔平在书中用了两章多的篇幅讨论战争与国际变革的关系。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的变革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居支配地位之大国的衰落和新兴统治大国的出现。任何一个霸权国家要维持其霸权地位，或应付统治成本的增长和防止衰退，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消除增加统治成本的原因，如削弱或摧毁可能的挑战者；二是扩大较多安全却较少耗费的防卫圈；三是减少国际义务。而对于一个正处于衰落的国家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方法是发动战争来削弱或摧毁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因此，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霸权战争”（即世界战争）。一次霸权战争后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它改变了国际体系，使之适应新的权力分配。

当然，除了战争以外，和平的变革始终是人类所向往的，并且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被“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所取代，并不是通过英美之间的战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英美两国在战争中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英国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通过“绥靖”政策而逐步解决了同其一个个对手的分歧。例如19世纪末对美国在美洲之霸权地位的承认，确立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1902年的英日联盟，使

日本成为其在远东的伙伴；1904年的英法协约，缓和了两国在地中海和其他殖民地的矛盾；1907年的英俄协议，解决了两国在远东的冲突。即使是30年代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在吉尔平看来也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不能以常理论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变革的要求和可能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大地增强了。这主要是因为，核武器的出现使任何全面战争都变得成本昂贵而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承担。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战争与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系列有限的战争同样有可能促进国际体系的变革，特别是核讹诈和核扩散之可能性的出现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得过去的得失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使得和平变革国际体系的可能性更为现实。但是，相互依存并不能解决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没有消除国家间的竞争和相互不信任。“相反，随着相互依存性的增加，国家变得更担心失去自治权以及担心诸如进入外国市场、原料来源的安全以及与相互依存相关的代价。经济民族主义就隐藏在表面的平静下面，作为对民族主义的回答，本世纪国际经济的突破性进展已经成为冲突中的起作用的因素。”特别是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的巨大动力。

(三)

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对我们认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首先，吉尔平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国际问题的新方法。正如本文在一开始时所提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当前国际问题研究中非常流行的方法，而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是这一领域最早的研究著述之一。吉尔平在书中不仅系统论述了

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而且在分析国际政治的变革问题时，具体应用了这些观点。例如，他在分析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时，就运用了寡头垄断理论、卡特尔理论、收益递减理论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在对国际变革之基本动力的分析中，他运用了社会学的结构理论、经济学中的损益估价理论、依附理论等等。

其次，吉尔平对国际体系变革模式和大国对变革之态度的分析，特别是对美国战后霸权地位的衰落等问题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之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强弱是至关重要的。英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两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就在于它作为世界工业中心的地位。英国的衰落也首先是从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停滞开始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命运转折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如此之强大，以致使其领导人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使其拥有的资源与所承担的义务达至平衡。在冷战的第一个10年，美国靠耗费其国际财政储备和缩减国内的消费来资助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兴和同苏联进行对抗；在冷战的第二个10年，它靠贸易盈余和印制钞票来维持其在全球的军事和政治地位。8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为资助美国的全球地位而付出的高昂代价。

最后，吉尔平对霸权战争的分析也是很有新意的。在分析战争问题时，传统的理论一般着眼于分析战争的根源，人们可以列举出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体制上的及领袖个人等很多方面的原因。吉尔平则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战争与世界政治变革的关系上，认为国家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特定位置，在于维护或变革特定的国际体系。关于核时代、相互依存的时代以及全球社会出现的时代之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他提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完全解决战争问题，而且也没有完全排

除核战争可能性；相互依存并不等于没有冲突；“全球社会”中的政治分裂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因此，战争的动因并没有消除。这与一般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不同的。

当然，对吉尔平的许多观点我们也是有保留的。首先，吉尔平在书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些理解是带有很大偏见的，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国际变革的结论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其次，吉尔平在书中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从新现实主义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但是他最终也未能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即以权力关系为核心来论述国际关系问题。此外，吉尔平对国际变革的分析尽管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也存在许多漏洞。例如，他把国家对预期收益和预期代价的估计作为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力，以及国际体系的变革完全是一种权力再分配的反映的观点，就有些偏颇。最后，吉尔平对80年代后国际体系变革的估计，在今天看来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应该看到，本书出版于1981年，没有人能够在当时预见到10年后的今天国际形势之剧烈变动。尽管如此，他对国际体系变革的一些基本估计还是基本正确的，包括对苏联东欧局势的大体看法和对美国地位衰落的基本估计。这也反映出吉尔平教授作为一名学风严谨的学者之科学探索精神。

1993年夏于中国人民大学

序

布赖恩·巴里 (Brian Barry) 在其 1970 年出版的杰作《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民主》一书中，曾划分并分析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理论建构方面的两种最重要方法——理论建设的社会学模式和经济学模式。为求得对国际政治变革的理解，本书将吸收这两种社会理论所提供的见解。无疑，上述两种理论各有建树，但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将只把它们视作一种启迪，而不是应予完全使用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得首先简要地探讨一下它们的长处和不足，以使读者熟悉本书的理论背景以及方法论基础。

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整个社会体系。诚然，对社会体系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它们都有一系列可证明是同一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突出特征是具有明显或隐约的相互关系。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其他社会角色，社会学理论都假定：个体行为要由其所处制度的性质及其在该制度中的地位来解释。社会体系是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其影响不是通过一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使行为者社会化，就是通过对行为者施加各种约束来实现。总之，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社会体系本身必须是理论建设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或者某些学者所称的理性选择理论，则与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它假定，个人行为是完全由合理性来决定的。^①个人力图在付出尽可能低

^① 加里·贝克尔：《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方法》(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ur)，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5 页；罗纳德·罗戈夫斯基：《政治学的理性主义理论》(Rationalist Theory of Politics)，载《世界政治》1978 年第 30 期，第 296-323 页。

的成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或至少是满足）某些价值或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合理性只适用于努力过程，而不适用于结果；因无知或某种其他因素而不能实现某一目标，并不能说明下述推理的前提是错误的，即个人在成本与利益或手段与目的的核算基础上行事。最后，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将力图实现其目标直至实现市场均等；也就是说，个人对某种目标的追求，要在相应的成本与已实现的利益相等时才会停止。经济学家正是极力按照这些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

社会学方法的长处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个人行为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决定因素上。在一个有原则和规范的世界里，个人的抉择和行为并不是完全由自己来决定的。况且，这些限制性的原则和社会结构也不能完全变得自私自利；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认为个人是按某些与其自身利益相对立的方式行事的。当然，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个人会（通过个体、群体或国家）谋求原则和结构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永远不能完全逃脱社会结构的各种限制。此外，正如珀西·科恩（Percey S. Cohen）所强调的那样，尽管个人和群体想增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行为却常常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无论自身利益还是社会结构，都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①

经济学理论的优点是，它体现出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一般概念，而这种概念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的变革。约翰·豪尔绍尼（John Harsanyi）认为，社会变革问题“最终要从一些人改变自己行为的个人动力方面去解释”。这就是一种变革理论。它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会断定，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利益。它的焦点，集中在解释技术的、经济上的及其他方面的变革，是

^① 珀西·科恩：《现代社会理论》（Modern Social Theory），纽约1968年版，第126页。